



我与贺龙

翁淑馨 述 吴如嵩 文

新郎自硝烟中下山，
 她的花轿也抬进了贺家。
 八年后丈夫出师未捷身先亡，
 而昔日火热的湘鄂西革命也
 风流云散转入低潮。
 她与劫后余生的贺龙族人
 开始了白匪追逐下的
 逃难生涯，
 未亡人与一个震动和元戎
 之家的传奇故事于此上演，
 一直绵延了60余年。

沿着人间
 悲欢离合的情感，

公那忠贞而崇高的品格令人
 起敬。

些闻所未闻的秘事珍闻
 你耳目一新，拍案称绝



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
的事业。

翁淑馨同志：

知道你已经入了党

望你在党的教育和培

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战

我与贺龙

翁淑馨 述 吴如嵩 文

紅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

感谢你惦记起逸群革命先烈，

也对他无限亲切怀念，愿我们在党

的领导下，完成

愉快！

祝你

入党，十分光荣，
教育和培养下，
得新的战果。

红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

入党，十分光荣，
教育和培养

战果，心
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贺龙: 翁淑馨 吴如嵩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33-1050-2

I. 我… II. ①翁… ②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插页: 2

字数: 119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8.00 元 (膜)

贺龙致翁淑

馨函手迹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翁淑馨同志：

知道你已入了党，十分为你高兴。希望你党的教育和培养下，继续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成绩。

我们老同志确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后代，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你能不断收集革命文物，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怕这是一项平凡的工作，只要我们大家都来作这个工作，就会逐渐充实起来的。

6.22.56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感谢你惦记起逸群革命先烈，我也对他表示亲切的怀念。愿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先烈未竟的偉大事業。

祝你

愉快！

贺龙 4月19日

过铜山傅名周通群同志诗十二首

西党名員救通群，如血如炭見丹心。一盤土法使
我懷，愧我同指負人。

西黨名員不顧身，赴難出關見光明。大衣白表

皆如那，獲得解中救時民。

紅樓樓下不回頭，打破銅山見光明。時家慷慨偏作

信，萬事以心壯一腔。

青竹山中青竹枝，人比竹節更堅奇。那如一湖成十岳

在位，強等這活樣。任明把柳，又剪亮工功未就身先

斃，不計百萬家。

兩江天一岸，風雨同舟共渡難。那如一湖成十岳

在位，強等這活樣。任明把柳，又剪亮工功未就身先

斃，不計百萬家。

西黨名員不顧身，赴難出關見光明。大衣白表

皆如那，獲得解中救時民。

紅樓樓下不回頭，打破銅山見光明。時家慷慨偏作

信，萬事以心壯一腔。

青竹山中青竹枝，人比竹節更堅奇。那如一湖成十岳

實前居雅叔年號，同是義旗七秩來。往日建忠誠
敢於王侯血戰刺何人。
重一老臥龍潭，三尺青台以步蹤。向望吳家兄，與
我衣襟我古書看。
道望沈江萬壑迎，拒山披浪恨共難。世橋平會
言冰凍，不難人作自自。
難已，攜文位女高情，有神仙心頭。病甲猶執見人
句，如向高堂，托履投。
角清竟有米，老而床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月不見，仁心悲，亦不棄。日痛甚，今日口口口口
他學徒子心。
依此打，創存期，老臥龍潭，却自福。這國元戎，實
歌元，四家狗，口口口口。
按實排，字仗祖，報月，報天，地現青天，相救視，人
長春，安度，陶唐，年福年。
賀錦章詩手迹
一九二九年一月于成都

賀錦章詩手迹

五十二年春重过铜在昔村惜旧感而有作

带水襟山也自奇，铜在屋梁犹面昔。曾避山今重出，毋抛珠玉觅旧题。

注：我五十四年春再过此地。

五十二年不年去，那知一别至今春。花田知有江边柳，为尔依依接远忙。

其二

宿昔坐堂吟哦，咫尺长街不遇。倚看身经槐树下，怕听山鸟噪哥。

其三

注：时先兄侍南随军拉马，往北平，都言同本共难，述四月廿八。

此地当年似汾阳，韩原未多又未暇。人从改陷深山里，只有凭窗救。

其四

注：铜在在解放前，军调土座为多，此地任人从防，于中大之中，有甚难，则答。

其五

王谢堂前不可居，吮啖燕子也知羞。射御泥竹常竹壁，转向乙辰陈姓也。

其六

军调连年援兵久，杀人犹如杀猪羊。而今报应归何处，犹在城中看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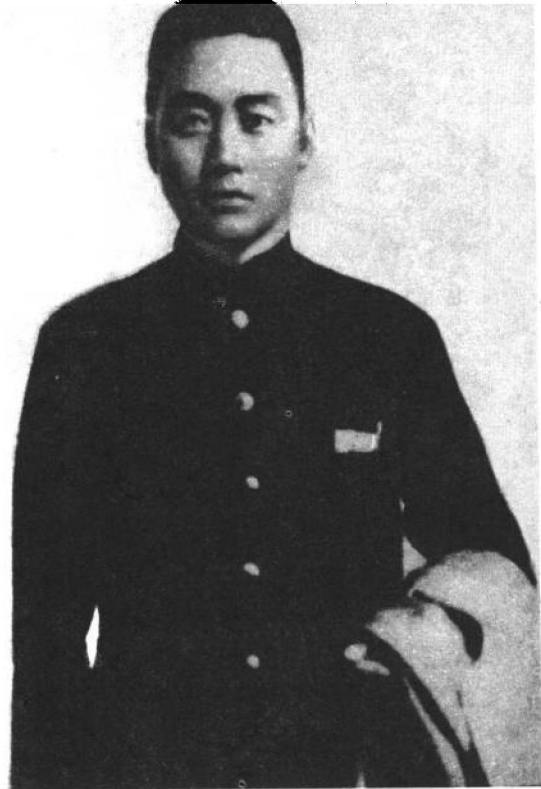
其七

登楼遥望五山中，一厂矿烟蔽碧空。广大之民多易气，余一战线显其水。

其八

我与富家是旧交，哀年走马不斜遥。相逢海晏风清日，有酒何妨醉一遭。

锦章九日诗作感留宿叔馨月知存



湘鄂西红军和苏区
创始人周逸群
(1896·6·25 1931·5)



湘鄂西边区革命武
装创始人贺锦斋
(1901·2·4 1928·9·8)

整理者序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我捏着的不是“亡友”的“遗文”，而是“先慈”的“遗文”，因而，这“一团火”，使我“常常”感受的也就不是一般的“寝食不安”了。

《我与贺龙》中的口述者翁淑馨，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普普通通的党员。但她却有一段不算普通的经历，有一些不算普通的见闻。《我与贺龙》就是她对自己那一段不算普通的经历的回忆和感悟，是她对贺龙及其亲友的一些不算普通的经历的回忆和感悟。

记录整理她所了解的贺龙及其亲友，说来已是 38 年前的事了。

1960 年，我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二年级。我的家在铜仁，由贵阳去铜仁没有火车，只通公路。虽然两地相隔只有

483公里，但全是山路，要走整整两天，车费竟要13元。当时，母亲在铜仁地专机关托儿所当所长，月薪50元，却要负担一家老小6口人的生活，因此，我寒暑假回一次家实为不易。

这年夏天，临近暑假时，母亲寄来了15元钱，我真是喜出望外。这15元钱，除掉车费13元之外，另外两元钱勉强可以作为两天行程的食宿费用。

那天，当我整理好行装，去向班主任老师告别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说：“学校提倡中文系学生利用暑期时间了解社会，增长才智。比如访问革命老人，撰写革命回忆录就很有意义。长征时，铜仁是黔东特区，老革命不少，可以去采访一下嘛。既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又可提高写作能力。”

班主任老师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有心一试。我知道母亲曾是贺龙的嫂子，在湘鄂西打过游击，但是，对其详情却不甚了了。我也听说，大舅翁锡益在解放前曾是铜仁地区的地下党员，想必也有十分精彩的故事。回家的路上，我盘算着一定得利用这一个月的暑假采访、撰写几篇革命回忆录。

一到家，我便向母亲说明了学校的意向和自己的打算。那时，母亲已年近花甲，两鬓飞霜。她静静地听完我的意见之后，说道：“明天先去给你爸爸上坟。大老远地回来，先休息两天，革命回忆录可以写，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保你可以向老师交卷就是了。”

第三天，她就开讲了。她的故事一讲，就像开了闸的水流

一样滔滔不绝。她讲得很兴奋，我听得很入神。她下了班就给我讲，我就匆匆记。她上班去了，我就忙着整理。我被她那坎坷的身世和革命前辈们光彩夺目的业绩深深地感动了。一个暑假下来，记了厚厚的几大本。

回到学校后，我又对所记材料进行了几个月的整理，写了一本题为《峥嵘岁月》的书稿，大约五六万字。我誊抄了一份寄给母亲，请她审读。过了一段时间，她回信了，并附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峥嵘岁月》动生离，弱柳孤蒲枉自春。

伤心难话前朝事，教儿濡墨问将军。

她的诗写得很沉重，也很动情。原诗是一首七律，可惜中间四句的颌联和颈联，已不复记忆了。知她决定给贺龙写信，我当然十分高兴。但是，当时我也犯疑，昔日的“将军”，今日已是堂堂“元帅”了，他能理睬吗？可我还是代她给贺龙写了一封信，随信还附了两篇短文：一篇是《周逸群同志二三事》，一篇是《忆大姐贺英》。信和文章由她审定我抄正，最后自贵阳发出。不久，贺龙元帅亲笔写了回信，信的全文是：

翁淑馨同志：

知道你已入了党，十分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继续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成绩。

我们老同志确有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后代，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你能不断写些革命回忆录，收集革命文物和资料，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怕只是一鳞半爪的，只要我们都来做这个工作就会逐渐充实起来的。感谢你惦记起逸群等革命先烈，我也表示对他们深切地怀念。愿我们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完成先烈未竟的伟大事业。

祝你

愉快！

贺龙

1961年4月19日

毫无疑义，这是一封十分珍贵的来信。因其珍贵，贵州省革命博物馆不久即将此信原件收去，作为馆藏文物。贺龙的来信，对于母亲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她反复地阅读，激动不已。我曾经问过她：“这信像当年贺老总的笔迹吗？”她笑着说：“当年？那是3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他哪有现在这么高的书法水平呢？”我还问过她：“当时，您估计贺龙会回信吗？”“会的。”她说。“为什么？”我又问。“贺龙那个人念旧得很，我晓得；更何况写革命回忆录是正事，是革命传统教育，他当然会支持。”

贺龙的来信，使母亲在铜仁这座 10 里山城出了名。中共铜仁地委对于贺龙来信的嘱示也十分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叫姚谱的“秀才”负责记录整理母亲的革命回忆录。

姚谱记录整理的两大本回忆录刚刚写出初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临了。因受贺龙冤案的牵连，一夜之间，我的母亲被打成了“土匪婆”；姚谱所写的初稿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早已化为灰烬。为了避祸，我那《峥嵘岁月》的手稿及笔记也通通付之一炬。

1963 年秋，贺龙的堂弟贺锦章曾邀请我母亲在成都客居一月之久；1976 年 9 月，母亲回请劫后余生的贺锦章来到铜仁。这次会见之后，她再度涌起想写回忆录的愿望。她送走贺锦章，不久即来到北京。她告诉我说：“‘文革’时，‘造反派’诬蔑我是‘土匪婆’，大字报贴到了十字街的闹市上，想毁坏我的名节，真是岂有此理。我在批判会上同他们辩论。我说：‘敦武参加的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烈士，怎么是土匪？对于贺龙，我只知道他打土匪，我亲眼见过。铜仁、松桃、秀山的土匪他都打过。活着的人，铜仁还有，你们可以去调查，看我说得对不对？你们骂我是土匪婆，不仅是骂我，也是骂革命烈士。’我这个‘土匪婆’的帽子，直到 1975 年贺捷生奉周总理之命看望因贺龙问题受牵连的人，来到铜仁，才被摘掉。”

她还悲愤地对我讲：“锦章的遭遇比我更惨，被游街，戴高

帽子。他对我讲：‘嫂子啊，我当时真是想只求一头撞死算了。他们简直拿人不当人，我真是想不开啊！为了革命，我们是一门忠烈啊！结果落到这样的下场。我真是想不开啊！’他这是掏心窝的话。锦章还对我讲，‘证明贺龙、贺英、贺敦武不是土匪，史料有的是。中央也作了结论。但是，活着的人中，能够站出来现身说法的舍您丘嫂其谁与？’我说：‘你这样讲，我担当不起。’他又说：‘这不是客气话，了解贺龙南昌起义以前的事的人，活着的还有几个？’”说完母亲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接着又深有感触地说：“我是革命回忆录一篇没写成，却戴了一顶‘土匪婆’的帽子。当然，‘文革’这种事，谁也料不到；但是，贺龙既然抬举我，把我放在‘老同志’的行列里，嘱我写回忆录教育后代，我不能不写。不然，怎么对得起贺龙在天之灵呢？”

“文革”之后，母亲苍老多了，但她对发表自己回忆录的愿望却十分强烈。我深深感到，这种愿望来源于她对贺龙惨死的悲愤，来源于她对先烈创业的缅怀，来源于她对自己那一段不平常经历的感悟。于是，她又多次口述往事，我又重新记录整理。尽管那时我的工作和家务十分繁忙，但是，我不能不帮她写，特别是每当脑海中浮现出她那期盼的眼神，我就像受到电击一样，不能自己。这样，先后在《革命文物》、《征途》、《贵州文物》、《山花》四个杂志上发表了《鳞爪漫忆》、《贺英轶事琐忆》、《贺龙两次出师铜仁闻见录》、《风雪鄂西传尺书》等。这几篇文章发表之后，她得到了慰藉，解脱了久蓄于心的痛苦

——那“土匪婆”给她心灵造成的创伤。

1982年她第三次来京，这时她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这次来京，是闲居，为的是安度晚年，以求养颐之福。不料，有一天患了胃病，虽然服药之后很快就好了，但是，她思想上却背了包袱。她趁我上班时悄悄地在为自己做寿衣寿鞋，并且怕我担忧，嘱咐我爱人，不要让我知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惊恐，决心采取各种方法解除她的思想负担。我知道，大凡老年人都喜欢忆旧，忆旧能医治心灵的创伤。于是，我常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她的往事。令我惊异的是，她不仅乐于谈往，而且理念和睿智的成分明显增多了，并且敞开心扉让我解读。她时而细语谈些秘闻，时而大声讲些趣事。她不再是为了发表回忆录而追述既往，而是在拉家常，摆龙门阵，常常不无揶揄地说自己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记得一天她讲了这么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有一次她与贺锦章看一部反映贺龙的电影。散场后，有人问贺锦章：“贺老，您看贺龙演得像不像？”

贺锦章回答得很干脆：“像个伙夫。”

他的话引来众人一片笑声。

她说：“说是像伙夫也太挖苦人了，但是，演得确实没有神。”

贺锦章似乎对他的“伙夫”之喻颇为得意，又坚持说：“贺龙那个人，往那里一站，就虎虎生威，就有那么一种威武之

气。电影上那个贺龙哪里有那种气势？”

然后她对我说：“贺锦章讲得对。演电影、演戏如此，写书写文章也如此，不传神，没有人看。”

这样的长谈进行过多次，她谈的是佚闻而又在佚闻之上。

通过她的谈话，我常常想：她自1924年与贺敦武结婚，至1931年回到家乡，前后不过8年时间。虽然这8年时间对于她的一生来说是短暂的，只不过占她一生的十分之一，然而这8年却是她一生中最痛苦、最艰险的8年，同时又是最使她引为自豪和骄傲的、难以忘怀的8年。对于她来说，一生中，忘却了多少个8年，而惟有这8年却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记忆里：她不能忘却贺龙，不能忘却周逸群，不能忘却贺英、贺敦武、贺锦斋、贺桂如，不能忘却蹇先任、贺锦章……，不能忘却他们的音容笑貌，不能忘却他们的一言一行。她忘却不了那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豪迈，也忘却不了那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恐怖。她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几十年前贺龙写给她的信，也能准确无误地唱出当年所唱的革命歌谣；她能清楚地回忆起亲身经历的重要事件，也能明确地说出发生那些事件的时间和地点。

这一切能够仅仅归之于记忆的好坏吗？我以为是不能的。诚然，她的记忆力是极强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她一直把那8年岁月当作书本去经常阅读，时常温习，以致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与她的灵魂同在。

我的住地离颐和园较近，而她对于古迹和湖光山色又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每逢节假日，我便陪她去颐和园散步，谈天，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一天，我陪她在颐和园的苏州街散步。苏州街那宁静的气氛，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她的谈兴也很浓，就在她对过去那段艰难困苦的经历执著回忆之时，我仿佛觉得从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可以看到一个旧式妇女走向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我还可从她的谈话中寻绎出贺龙由一个民主主义斗士走向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印记。

我这才发现，过去虽然为她写了几篇文章，但是挖掘不深，仅仅停留在对见闻的平铺直叙上，实象多，意象少，忽视了她自己对周围人事的感情抒发，较为直白。我深深感到，她虽然文化水平并不很高，但是，她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远在我的认识之上。当时，面对着她，我那文科大学毕业生的优越感一时之间竟跑到爪哇国去了。我决心对她所述材料进行仔细的思考、研究，对她进行进一步的深度访谈。有利的是，我可以随时问，随便问，问的深浅正误都不必在意。反正，她把属于她所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她把她对那段历史的体悟和表述，毫无保留地通通合盘交给了我。记得某位哲人说过：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如果你懂得如何解读它的话。我想到这里，不禁怦然心动，母亲的一生不就是一本书，而且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书吗？于是我向她表示要为她写一本书，她很高兴。以后，她谈得更具体、更细微，我也问得更深入、更广泛。时光一天一天

地过去，一个活灵活现的英雄群体似乎在我的脑海里呼之欲出。1983年秋她离京回乡，1985年，她80大寿，我在祝寿诗中表示：“遥祝母亲长寿考，莫失腹中未烧书。”不幸的是，次年她就与世长辞了。写书的事，便拖了下来。

这一拖就是12年。其所以拖，无非是忙。然而，延迟竟12年之久，直到今天，我也已年近花甲，两鬓如霜，才来“给它企图流布”，愧疚之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天下的事或许都有双重性，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异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头。”今天，我已感受到这种因“惊异而敬畏”所产生的激情的冲动，魂牵梦绕，于是，决心利用工作之余，偿还先慈的宿愿。

毋庸置疑，《我与贺龙》所述所写都是信史，经得起当代乃至后世的检验。不过，它所述所写既没有官修史书那样的博大堂皇，也没有记述那些站在时代前列的风云人物轰轰烈烈的革命壮举。它所记所述的多是一些平常琐事，即使是写贺龙、周逸群这类大人物，所写的也仍然是他们的一些小事。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过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文学家郁达夫似乎说得更有意味，他对抓取事件的一鳞半爪，以小见大，喻之为“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因此，我以为本书在革命回忆录的百花园中虽然只是一朵小花，一